

廉價的煽情掩飾不了違法事實

——評「卿卿如晤——致鄒幸彤」文章

銳評
子言

利用文宣來煽惑人心，是亂港勢力的「強項」。近期，被控違反國安法的鄒幸彤，其未婚夫野渡以一篇「卿卿如晤——致鄒幸彤」的文章，成功引起了外界關注；而再早之前，黎智英的兒子以「父親很可能要在獄中渡過餘生，父子恐不能再相見」替其開脫。一對準夫妻，一個父子情，顯而易見，這些人很懂得通過文宣包裝來轉移視線，將黑說成白，將破壞者說成「受害者」。然而，相對於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對香港所造成的破壞，這樣的廉價煽情手段又豈能掩飾得了其違法事實。

在這篇「卿卿如晤——致鄒幸彤」的文章裏，作者野渡挖空心思援引中西名著，肉麻地聲稱：「現實世界裏，情人的情書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得見」，以「相隔多年未見」的情節煽動煽情。但這樣的公開文章，難倒真的只是普通「情書」那麼簡單？

事實上，文章刊出後立即引起反中亂港分子的廣泛轉載，一些人更是聲情並茂，借之「控訴」特區司法部門「濫告」，並將鄒幸彤塑造成一個為香港付出的「政治良心犯」；一些外國反華勢力也是趁機攻擊香港特區，抹黑國安法，揚言制裁，一副殺氣騰騰之狀。至於鄒幸彤的犯罪事實，卻是隻字不提。

將破壞者說成「受害者」

這樣的伎倆，香港人實在太熟悉不過了！過去三年多時間裏，反中亂港勢力類似的「軟文宣」層出不窮。從煽動暴亂所用的「你們殺不死我們」等口號標語，到竄逃海外後的「香港人，報仇」等文宣字句，無不是想要達到一個目的：轉移視線、逃避罪責。

然而，違法就是違法，再多的謊言也改變不了事實。鄒幸彤被控的絕非什麼「以言入罪」，而是無可爭議的刑事罪行。其所涉及的罪名，包括《公安條例》下的參

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以及香港國安法下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後者將在今年下半年審理，前者剛於1月25日有了終審判決，五名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恢復原審對鄒幸彤判囚15個月的定罪。

從原審、上訴再到終審，無論是案情還是具體的刑罰，早已通過媒體的全面報道而為市民所熟知。如果真的如反中亂港分子所稱的「以言入罪」，終院五名法官中有多名外籍非常任法官，又豈能作出完全一致判決？鄒幸彤有沒有違法，必須由事實及法律來說話，想以一封「情書」來煽動民意、替其洗脫罪行，今時今日，這樣的雕蟲小技，行不通了。

其實，鄒幸彤還押期間的待遇絕非亂港勢力所描述的那般「悲慘」。根據懲教署紀錄，還押期間鄒幸彤錄得429次親友探訪及62次律師探訪；而野渡亦曾在文章中說過去都能收到對方的信件。鄒幸彤是一名疑犯，還押期間必須遵從有關法

律的規定，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應有之義。

「卿卿如晤」並非個例，更不是最誇張的。另一宗國安案的主犯、《蘋果》老闆黎智英，其家人堪稱這方面「高手中的高手」。其兒子黎崇恩及其國際律師團隊，過去幾年在境外收買了大量海外政客和媒體，文宣極盡煽情之能事。

例如，黎崇恩去年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大打「悲情牌」，聲稱「父親很可能要在獄中渡過餘生，父子恐不能再相見。」其後又去信天主教世界主教會議，聲稱黎智英「只是一個普通的報章出版人、企業家，一個民主運動人士、良心犯」。不僅如此，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還告到聯合國，將黎智英塑造造成一個「自由鬥士」。

「軟文宣」伎倆早被市民看穿

漂亮的形容詞，改變不了違法的事實。連日來從庭審公布的大量「認同案情」以

及證人證詞可見，黎智英與外國勢力保持密切接觸，肆無忌憚地勾聯外力，操控旗下媒體發表煽惑文宣，叫囂制裁香港。試問，天底下有這樣的「普通報章出版人」？在黎智英及其背後反華勢力煽惑下，香港爆發長達一年多的黑色暴亂，數以千計的市民受傷，數以百億計的經濟損失，法治遭踐踏，秩序被破壞，自由蕩然無存，這就是所謂「溫和的企業家」和「慈祥的父親」幹得出來的事？

當年高叫「外國勢力萬歲」、「為美國而戰」的黎智英，狂妄得不可一世，如今面對法律處置時，卻是一副無比無辜之狀，虛偽得令人發笑。

經歷過2019年黑暴，香港市民早已看穿了反中亂港勢力的種種「文攻武嚇」手段，也領教了他們太多的「軟包裝」。再多幾篇這樣的「情書」或「家書」，也都不過是廉價的煽情而已！這樣的伎倆用多了，除了自我感動外，還能打動了誰？

用好香港優勢 提升灣區營商環境


議會內外
容海恩

今年是中央政府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五周年，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果豐碩。中央為推動大灣區更好發展，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不斷出台新政策舉措，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三年計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總規》）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橫琴規劃》）等，旨在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連結，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為整個大灣區帶來更廣泛的發展機遇，深化共同發展。

《三年計劃》提出了7大項、24條具體措施，目標是在3年內讓大灣區與國際通行的規則相銜接，因目前粵港澳在社會、法制、稅制等方面均不相同，需要加強互聯互通的工作，而《三年計劃》正能夠針對目前營商環境而提出相應優化措施，藉此提升發展的協同性、包容性，繼而建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促進大灣區內人才流動

至於《前海總規》則為深圳前海合作區定下四大戰略定位，分別為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高地，旨在發展金融、國際貿易、專業服務和高新技術、現代海洋等產業，吸引國內外企業落戶。《前海總規》為香

港各界別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機，同時也為香港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和生活選擇；而《橫琴規劃》則在就業、創業、住房、教育、醫療、文體、社會保障等多方面推動澳門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形成更為緊密的關係。

筆者認為，香港有責任亦有條件在大灣區內積極發揮自身優勢。首先，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體系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享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八大中心」定位，更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條件，是國際企業踏足內地市場，特別是粵港澳市場的首選之地。因此，香港需要用好自身在金融、商業方面的優勢和豐富經驗，為外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灣區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提供支持和專業服務，貢獻國家。

但除了金融服務，香港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國際化的教育體系，特區政府可致力促進大灣區內人才流動，讓各行各業均能受惠於大灣區的發展。概括而言，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以做到「三個結合」，包括「宏觀着眼與微觀着手相結合」、「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一體推進與示範引領相結合」，藉此更好地推動《三年計劃》的落實，引領帶動大灣區各城市全面合作。

具體而言，特區政府可以從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宣傳解讀，如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在香港進行現場宣傳，營造大灣區一流營商環境的良好輿論氣氛和社會討論；二是組織實施，透過細化《三年計劃》的重點任務，明確箇中時間進度和主體責任，確保政策落地見效；三是示範先行，充分發揮香港的開放平台和示範作用，善用優勢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拓展經濟

合作空間；四是統籌協調，即密切跟進《三年計劃》的落實情況，並積極協調和解決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此外，特區政府可透過深化大灣區城市之間共同發展為市民帶來更優質的生活、更廣闊的生活空間。當中除了為港人爭取更多到大灣區創業就業的機會，亦需要推動生活上的便利。按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在去年9月至10月期間所進行的《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學業篇》問卷調查，1000名受訪者中有逾70%有意到內地升學或進修，亦有66%受訪者表示願意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同時有42%已在廣東讀書的香港青年表示有意在5年內回港發展，可見香港人在兩地流動的潛力很高。

研究推出更多便利措施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研究推出更多便利措施，優化通關流程和作業方式，如爭取更多24小時口岸、落實更多「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運作模式，同時加強交通配套，以及推進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公共服務和互聯網方面的便利化應用等，讓市民可以更方便地在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工作、學習和娛樂，建立「一小時生活圈」。

總而言之，《三年計劃》、《前海總規》、《橫琴規劃》均可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的發展，將為香港帶來更多發展機遇。筆者期望，香港能夠發揮好獨特優勢，深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和合作，繼而讓市民能夠感受到到大灣區發展帶來的好處，實現更美好生活。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

到底什麼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有話要說
許子東

言論自由是有界線的，違反了法律，就必須承擔後果。新聞自由同樣有界線，任何人發虛假消息並導致嚴重後果，將面臨法律的懲處。但就是這麼淺顯的道理，在一些反中亂港勢力眼中，竟然有「另類解讀」。例如，將鄒幸彤發文章煽惑罪成稱為「打擊言論自由」，又將特區政府成立應變反駁隊回應網上抹黑23條立法的決定，抹黑成「打擊新聞自由」。這樣的操作，實際上是在揭露反中亂港勢力的可笑「雙標」。

已解散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涉於2021年在網上發表文章，煽動市民參加非法集會，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2022年1月她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囚15個月，鄒幸彤提出上訴，高等法院早前開庭處理，法官裁定鄒幸彤上訴得直，一併撤銷其定罪及刑罰。律政司再就該裁決向終院申請上訴。本周四，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

美西方可笑的「雙標」

但新聞報道後，一些反中亂港勢力坐不住了，發動各種網上輿論，用「以言入罪」來攻擊特區政府，並聲稱「香港言論自由不再」云云。這根本是在偷換概念、混淆視聽。事實上，不論是以香港特區的法律，還是以美英的法律，言論自由絕非沒有邊界的。

例如，美國法典第115章第2385條清晰列明禁止：「任何蓄意導致推翻或摧毀這類政府，印刷、出版、編輯、發表、傳播、銷售、散發或公開展示書面或印刷材料，煽動、勸說或教唆他人有責任、有必要、值得或適於以武力、暴力方式或企圖顛覆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

英國《1351年叛國法令》則規定，「圖謀、設想、計劃或意圖廢除女王陛下作為其所有領土的君主、發布煽動意圖的語言文字或其他可作誹謗的事物，煽惑他人擾亂秩序或使用暴力」，均屬違法行為。

在加拿大，《刑事法典》第61條規定，「發表煽動性的語言文字及誹謗」、「參與煽動性活動」，都可判處最多14年的徒刑。2005年，該國就曾有一宗案例，一名德籍加拿大公民因「明知可能會引起社會問題而繼續出版傳播錯誤資訊的書籍」、「鼓吹破壞政府和多元社會」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

由上可見，即便是在美英，任何發表了文章煽動社會，都會面臨嚴重後果。以美英的標準，鄒幸彤的違法言行早就被判入獄，所差的不過是刑期多長而已。若以美英以往案例而言，鄒幸彤的刑期不可能只是15個月，很可能是數年。何以反中亂港勢力看不到這些？到底是他們選擇性失明，還是想刻意抹黑香港的言論自由？

本周四，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表示，23條立法進入衝刺階段，他並表示：「大家在網絡見到一些抹黑或惡意攻擊的一些信息……我們會成立「反駁隊」，特別針對社交媒體，將我們的事實真相告訴他人。」

眾所周知，反中亂港勢力長期對網絡言論，從早年的23條立法，到2019年的修例風波，都可以看到他們如何散播錯誤消息、醜化特區政府、撕裂香港社會、製造恐慌的事實。而香港目前又沒有打擊假新聞的法例，正因如此，特區政府吸取經驗教訓，成立「反駁隊」，這絕非要打擊新聞自由，恰恰相反，這是在維護真正的新聞自由，讓公眾準確掌握信息。

事實上，西方針對網上假消息早有大量的法規法例。例如，「五眼聯盟」之一的澳洲，2023年6月公布一項法律草案，強制社交媒體必須主動刪除平台上的假訊息和錯誤訊息，違反者可被處以巨額罰款，最高達3600萬港元或全球營業額的5%。負責是項草案的澳洲通訊部長羅蘭強調，政府無意扼殺言論自由，但重申政府致力維護澳洲人民網絡安全，當中包括要求電子平台對其服務的虛假或錯誤訊息負責。

顯而易見，美西方本身嚴格規管網上假消息或仇恨消息，如今卻對香港的正常做法指手畫腳，立場虛偽至極。

法國何以不懼特朗普當選？


國際關係
宋魯鄭

特朗普以壓倒性優勢取得第一場初選勝利，震驚了歐洲。這並不難理解：一是歐洲作為美國的傳統盟友，雙方利益過於密切。絲毫不在乎歐洲利益的特朗普如果再度執政，損失最大的自然是歐洲。二是俄烏衝突進入第三年，歐洲戰爭疲勞感日益增強，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願意再為這場衝突買單。特朗普一再聲稱他將迅速結束這場衝突，無非是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持。歐洲自己顯然無法支撐。如果輪掉和俄羅斯的這一局博弈將重創歐盟聲望和凝聚力。三是整個西方都面臨共同的困境：內部面臨民粹主義的挑戰，外部則有新興國家的崛起。此時的西方特別倚重價值觀的作用。然而，特朗普如果再度當選，其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打擊將遠超第一次，制度合法性即使不被完全摧毀，也相當程度喪失吸引力。西方制度軟實力基本消失殆盡。

和許多國家反應不同的是，法國表現得相當無懼，總統馬克龍表示：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自己將設法與他合作，還美其名曰：「我接受人民選出的領導人」。形同完全肯定特朗普的合法性。

事實上，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法美不但沒有什麼合作，相反在貿易、氣候、反恐、伊朗核問題等問題上對立。特別是特朗普曾選擇在法國最敏感傷痛的日子巴黎恐怖襲擊三周年之際批評馬克龍。

法國無懼的根本原因在於，特朗普當選符合其國家戰略利益。

法國在二戰中國家地位墜入谷底以後，其最高國家戰略利益就是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社會中維持其大國地位，有效發揮在全球重要的平衡作用。為此在冷戰時，法國既「打蘇聯牌」也「打中國牌」，獲得了遠超其國力的國際地位。然而在冷戰之後出現的單極世界中，法國再也無法借力打力，大國地位受到嚴重衝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面對日益形成的中美兩極格局，以自己為核心推動歐洲走向戰略自主成為法國最重要的優先事項。

但是直到二十年以後即2013年，戰略自主一詞才首現於歐盟官方文件。真正加速則是在2016年及以後，這當然要歸功於特朗普當選和他的單邊主義。按照歐洲議會的劃分，轉折點就在2017年—2019年，並特別指出英國脫歐、特朗普執政是標誌性事件，從而令歐盟戰略自主表現為尋求捍衛更加廣泛的歐洲利益。

但是隨着2020年拜登入主白宮，美國宣布重返「大西洋主義」，法國推動的戰略自主勢頭再次受挫。特別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全面倒向美國，歐洲不但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甚至在失去俄羅斯之後，能源上也是如此。拜登短短幾年憑藉一個「大西洋主義」和一場衝突就把歐盟的戰略自主釜底抽薪。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一輪博弈中，美國重點打擊的就是法國。一是軍事上搶走法國和澳洲超過600億美元的潛艇訂單。這並非只是一筆生意，而是戰略性打擊。因為法國要維持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就必須進行成本高昂的軍事研發。法國作為

一個中等規模、軍購內需有限的國家要想能夠承受，就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這和美國軍需龐大僅靠自己就能維持開發成本不同。軍售對一些國家只是生意，但對法國卻是維持真正獨立的戰略性舉措。

二是通過俄烏衝突廢掉了法國的「俄羅斯牌」。拜登一上任就聲明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直接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從而刺激了這場衝突的爆發。世人可能記得，衝突發生前法國竭力斡旋，美國則刻意拱火。衝突發生後，當俄烏在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的斡旋下達成妥協時，又被美國否定。法美不同的做法就在於雙方的戰略目標完全相反。法國要戰略自主就不能失去俄羅斯，美國要一統西方，就必須打斷法俄的連結。

可以說，自從拜登執政以來，法國（以及歐盟）和俄羅斯一樣都是最大的受損者。現在特朗普民調大幅領先黨內、黨外的競爭對手，大有重返白宮之勢，對於法國來講可謂機遇即將再臨。

第一，美國重返單邊主義和放棄烏克蘭，歐盟內部對戰略自主不再分歧，法

國可以全力推動。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也無美可依。

第二，俄烏衝突哪怕只是停火，歐洲就不僅擺脫了一個戰爭包袱，也給重啟俄羅斯的關係創造了條件。特別是美國放棄烏克蘭並與俄關係改善，歐洲也減少了道德壓力。

第三，拜登為了遏制中國和挫敗歐洲的戰略自主，任內一直想把北約亞洲化，試圖把中美博弈放到北約框架中，特別是要把台灣問題變成歐洲的問題，從而制度性綁架歐洲，變中美博弈為中、美歐博弈。為此美國積極推動北約在東京設立辦事處。如果這個目的達到，歐洲的戰略自主就完全不可能了。為此馬克龍不惜獨自投票否決，並在訪華後明確針鋒相對地提出台灣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如果對北約毫無興趣，甚至多次威脅要退出北約的特朗普勝選，法國自然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

正是由於特朗普當選符合法國的國家戰略利益，法國才會表現得如此淡定無懼。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